



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强调，要牢固树立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新理念。

# “十三五”的潜台词

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了新的动力和增长点,但如何实现,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内的经济放缓,同时破釜沉舟式地“革自己的命”。

## 从旧动力到新动力

还有一个多月,“十二五”就要结束,“十三五”来了。2015年11月3日,新华社发布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(以下简称《建议》)。

“五年规划”全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,是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。“十三五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,该如何向小康“冲刺”,《建议》用2万余字给出了答案。此次《建议》共分八章,与过去几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相比,此次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篇章布局。第一、二部分讲

以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,标志着决策者思路的改变。

未来发展面临的形势、目标和理念,中间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的五大发展路径占据了最大篇幅。

《建议》提出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,史无前例地,《建议》中“创新”被提及71次,并且明确写明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”。

“这一提法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。”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日在“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会”上说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则对记者说,新常态的“常”要落在升级版上,就必须以创新为龙头加以落实。

## 旧模式难以为继

经济增长目标是市场最为关心的数据之一。对此,《建议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,而是提出“十三五”的主要目标是,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上提出,下一个五年经济年均增长的底线是6.5%。这意味着,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高速。

过去三十年,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采用政府主导投资的方式拉动GDP增长,今天,这一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头了。

经济学家王小鲁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我国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研究,他发现从1978年至2008年,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曲线基本重合。但在2008年以后,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,但是经济增长率却在逐步下降,两者间出现了一个“喇叭口”。

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,是产能利用率在持续下滑,资本边

“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,这个问题不解决好,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。”

际生产率明显下降,现在只相当于2000年的三分之一。“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?至少说明一点,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,并不是因为资本投入少了,而是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。”王小鲁说,“单靠政府搞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,已难以为继。”

以投资为动能的经济增长方式,结果便是产能过剩。

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大户”——房地产行业,库存居高不下。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同比增仅2.6%,远低于往年10%以上的增速。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-0.57%,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10.6个百分点,为199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。

房地产行业的低迷,使钢铁、家电等相关行业和连带的能源省份们,都面临巨大压力。

而对制造业增长至为关键的出口,早已告别几年前年增长20%的黄金时代。201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为负值,2015

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出现负增长。

今年1-9月,全国固定资产投资(不含农户)同比名义增长10.3%,“投资回落比较明显,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回落比较大。”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记者说。

从PPI(生产者价格指数)来看,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。“这就是所谓的通缩。”刘世锦说,“这是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,由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引起的通缩。”

但是,产能严重过剩的地方,稳增长的压力更大。“各个地方都想让别人减,自己却不减。”刘世锦说,“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,这个问题不解决好,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。”

金融风险集中体现在政府部门的债务风险。2008年之后,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明显抬升。

财政部数据显示,截止到今年9月末,国有企业负债总额

费和出口这“三驾马车”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矛盾。

“但凯恩斯主义说到底是个短期的政策,短期内在消费和出口无法改变的情况下,就只好加大投资,最后就形成现在的局面——产能过剩、投资效率递减和债务风险累积。”吴敬琏说,与凯恩斯主义相反,19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,则强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在于供给端,在于劳动力、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,“在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结束时,效率的提升最重要,而要提升效率,只有靠创新。”

776827.6亿元,较8月末暴增5.93万亿元。有分析认为,这是政府债务向企业债务发生了转移。

财政部10月份公布的截至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地方债总额是15.4万亿元,其中大多是3-5年的中短期银行信贷。“以银行抵押贷款为主体的债务,与市场发行的债券不同,极易引发连锁反应。”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说。

最令人担忧的,是债务风险传导到金融体系。根据16家上市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来看,当前16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9080亿元,同比猛增近三成,其中15家银行的不良率均出现攀升。

“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新阶段增长转型面临的一个矛盾。”迟福林说,传统的增长模式是和过去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,但现在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,如果继续下去,只能积累更多的矛盾、风险。

## 恶性循环的“陷阱”

旧的增长引擎面临熄火,但其惯性仍然极大。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”,早在1995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就已提出,但二十年过去了,依然没有大的改变。

“其原因在2005年制定‘十一五’时总结过。”吴敬琏说,当时引用了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”的说法,“最主要的障碍是,政府掌握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,且各级政府都把GDP增长作为自己政绩的主要表现,将手中的权力、资源大量用于高增长”。

时至今日,体制性障碍依然

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了四个“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反常”。

是这次“十三五”规划中要破除的重点。《建议》称,要“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”。并且,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”,这比“十二五规划”中的“行政体制改革”更进一步。

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发现,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了四个“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反常”,分别是:经济下行的同时,实际利率上升;经济下行的同时,劳动力成本上升;实际利率上升的同时,资本回报率下降;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,发生通缩。

在研究中,白重恩只能用一

个“二元经济”假说对上述四个反常加以解释,他把中国经济分为两个部门,一个是“政策扶持部门”,另一个是投资行为市场化的部门。

“由于政策扶持部门存在‘软预算约束’,和经济下滑时的扩大投资的冲动,导致实际利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。同时,过度投资和低效投资,又拉低了资本回报率。其产生的过剩产能,又导致了通缩。”白重恩在财新峰会上说。

但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,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“陷阱”。去过剩产能和通缩,会加大经济下行

的压力,而GDP增长率的过度下滑是政府难以容忍的,接下来的经济刺激必然又导致“政策扶持部门”的扩张。

其结果便是,“非政策扶持部门”承担利率、劳动力成本高企、资本回报率低的后果,进一步萎缩,市场价格信号进一步扭曲,过剩产能和通缩更加严重。

白重恩认为,走出这一陷阱,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放缓,通过国企改革、货币政策改革缩减“政策扶持部门”规模,同时通过减税、降低社保费率等为企业降低成本。

## 新的增长点

多年来我国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,目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度只有50%,电信业、健康服务业等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都还没有放开。

对中国经济,《建议》提出的新的增长点,是服务业。

服务业包括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。“生产型服务业,是构成新动力的主要方面。”刘世锦说。

发改委数据显示,前三季度,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提升至历史新高,达到51.6%,首次超过一半。“估计到2020年占比将达到55%以上。其中,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%左右提升到30%左右。”迟福林预计。

在刘世锦看来,新动力在一些新行业、转型升级、新技术等领域,能够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,但在大规模方面作用有限,只要把新的动力搞起来就可以弥补旧动力的下降是一种误解。

“显然,新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完全弥合旧动力带来的经济下滑。”刘世锦认为,原来的老动力还有空间,“关键是在原有竞争领域中找到低效率的洼地,开放市场、允许竞争、允许要素充分流动,就能够新增投资,还可以提升投资效率”。

不管是培育新动力,还是开放老动力中的“洼地”,都需要改革。

迟福林认为,多年来我国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,目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度只有50%,远低于工业部门的80%,比如电信业、健康服务业等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都还没有放开。

2015年前三季度,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.2%,其中,全社会需求增长较快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偏低。“北京这么多人口,才几家儿童医院,投资严重不足。”迟福林说。

与此对应的是,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等方面的监管薄弱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李克强总理谈到,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、蛟龙入海,为什么国人还要在海外疯狂买马桶盖、保健药品?

“这说明我们的监管不到位,产品质量没保证。”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。

“过去三十年是制造业开放的成功,未来三十年将是服务业开放的成功。”国泰君安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对记者说。当前很多人都到国外消费,说明我们国内缺的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,因为我们有各种的管制。

服务业开放与政府改革密不可分。“最核心的就是化繁为简,放松行政管理。但是这个太难。”21世纪宏观研究院研究员谭翊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虽然现在行政审批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,但是他曾经就多次遇到,这个项目取消了,但是另一个项目又出来了。“中国地方很大,靠中央监督地方,放松审批监管,很难实现。地方可以巧立各种名目重新设立另外的审批。”

(据南方周末)